

近代文献丛刊

文学兴国策

上海书店出版社

点校说明

中日甲午之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被过去一向藐视的“岛夷”小国日本所打败,朝野上下深受刺激,变法图强的声浪骤然高涨。1896年上海广学会编译出版了关于甲午战争的文献资料集《中东战纪本末》,引起了国人的广泛注意。就在这部书籍的后面,还附录了一部篇幅不大的著述,那就是由日本森有礼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与光绪进士任廷旭(曾担任过驻美公使的随员,并游历过日本)合译的《文学兴国策》,对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森有礼(1847—1889)出生于萨摩藩武士家庭,早年留学英国,1870—1873年出使美国,归国后任外务大臣,大力传播、普及西洋思想,1875年任驻清国大使,1879年任驻英大使,1884年回国后任参事院议官兼文部省御用,次年担任近代日本第一任文部大臣。他通过多年对欧美诸国的考察,认为西洋各国首先是一些富国强兵之国,而要走上这条发展道路,除了实行开放政策外,必须注重国民教育。因此,他在使美期间曾向美国政界、学界发函咨询教育强国之道,并就教育的效用开列了五个方面的细目,即教育对一国物质繁荣所发生的影响、对商务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影响、对人们社会道德及自身完善的作用、对法律和政体变革

的影响。函件发出后,得到了美国各界的热烈反应,有识之士纷纷复函,各陈己见,其中有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Theodore P. Woolsey, 1801—1889)、安汉斯德大学校长施瑞恩(William A. Stearns, 1805—1876)威廉斯大学校长郝普经(Mark Hopkins, 1802—1887)、哈佛大学校长欧理德(Charles W. Eliot, 1834—1926)、哲学家和教育家西列(Julius H. Seelye, 1824—1895)和麦高希(James Mclosh, 1811—1894)、政治家鲍德威(George S. Boutwell, 1818—1905)和加非德(Jams Abram Garfield, 1831—1881)、著名物理学家恩利约瑟(Jeseph enry, 1797—1878)、数学和天文学家满勒(David Murray, 1830—1908)、传教士潘林溪(Octuavius Perinchief, 1829—1877)和脑德禄(B. G. Northrop, 1821—1898)等知名人士。森有礼遂将这些函件加上自己在美国教育部(旧译“文学部”)抄录的有关教育制度的资料,编成了这本《文学兴国策》(这里的所谓“文学”,不是指文学艺术,而是指文化教育),送回国内。日本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仔细研究,择要付诸实施,对日本综合国力的增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森有礼本人亦因致力于教育制度的改良和完善而被授予子爵。

本书的翻译者之一林乐知,于 1859 年底奉派来华传教,在中国活动了近半个世纪。他曾先后被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聘为教习和译员,后来还自办中西书院和参与广学会的活动。林乐知在华的活动,除了传教以外,主要是译书、著书、兴学和办报,《文学救国策》就是他的译作中较为著名的一部。林乐知之所以选择此书,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在教育方面的诸多弊端而发。早在光绪八年(1882),他就对中国的科举制度的缺陷提出过批评。森有礼的《文学救国策》一书,正好应合了林乐知期望中国的教育制度向美国学制学习、改造的方向,因此他就趁中国在战败后反思的机会,将这一思想藉日本的实例,向中国的知识界推广。此书在中国出版后,果然引起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对晚清维新思想

的酝酿起了积极的影响,民国初年“教育救国”思潮在知识界的盛行,也与这部译作有密切的关联。

本次标点整理所根据的底本为该书的初印本。

甘慧杰

1999 年 3 月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3
日本驻美国京城护理公使森有礼公函	1
埃尔博学书院监院华尔赛复函	2
安汉斯德大书院监院施端恩复函	5
纽约彼得哥伯复函	8
潘林溪教师复函	13
安汉斯德大书院总教习西列复函	27
伯林斯登大书院监院麦高希复函	32
华盛顿京城恩利约瑟复函	35
维廉士大书院监院赫普经复函	39
纽孛仑斯威大书院监院康孛阑转送总教习满勒复函	45
冈奈底格邦文学部总办脑德禄复函	56
哈法德大书院监院欧理德复函	59
美京文学部大臣鲍德威复函	60
美京下议院绅继升民主加非德复函	62
美国兴学成法	67

序 一

《记》有之：“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又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又曰：“能为师，后然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古之君，即今之三公、保傅，五等之爵也。然则学顾不綦重欤？重学而顾可不尊师欤？中国学校之设，首敦实行。学以致道，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学以明伦，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晋唐以降，文胜质微，躬行君子未之有得。国朝沿明成法，以制艺取士。果能代圣贤立言，阐发六经精蕴，神而明之，修齐治平，不外乎此。乃自士风不振，舍本逐末，钞胥剿袭，文品日卑，学之所由废也。余读林乐知先生所译美国诸名流振兴文学成法，不禁喟然而叹曰：“四裔有学，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中国之学，取民之秀者，升之胶庠，有男学而无女学。且以为秀者宜学，愚者可不学；士可学，百工可不学。噫！隘已。泰西大书院、普学院，文全学备，科第可出其中。余若高等学堂、中等学堂，既有男学，复有女学，且秀者学，愚者亦学，百工亦莫不有学。规制严备，井然有序，取适用不取虚文，以较华人之伸其占毕、多其讯言者，不犹愈乎？昔者，孔子学于郯子，程子观僧饭而叹为三代之威仪，比物此志也。此书为日本前任驻美公使森君殷殷访问而得之者。美国广兴文学，百余年间，日新月盛。日本得其成法，以行于数岛之中，不过二十余年，各国递相引重，况我中国

自有学校，自有宏谟，更采刍蕘以匡不逮。人才辈出，国势淳兴，直指顾问耳。用弁数语，以质有道。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三月中浣，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合肥龚心铭序于海上寓斋。

序 二

《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知天下之势，不值其穷，则不变。不变，则无以通且久也。《中庸》曰：“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是知世人之心，不启其明，则不动。不动，则无以变而化也。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是知治国之法，不知所变，则不进。不进则无以至于道也。夫强弱者，势也。明昧者，心也。变通者，法也。世无亘古不能变之法，人无愚昧不能明之心，国即无积弱不能强之势。欲变文学之旧法，以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强之国势，此《文学兴国策》之所为译也。盖尝旷观古今之时变，横览万国之兴衰，而叹日本之崇尚西法，其变化之纯全，功效之迅速，实为天下古今之所不能及也。日本僻处东方，初不过海中之岛国耳。自通商开化以来，改易政权，振兴文学，驯致民生日聚，财物日富，国势日强，几与欧美诸大国相埒。岂无道以得之哉？试即其未通商以前之情形，而观之其政俗，与中国大同小异。其教道亦从中国、朝鲜而来，以神道教为国中之本教，而儒教、佛教，亦并行而不悖。然而一姓相传，历世已一百二十有二，历年已二千五百有余，不动不变，无复有继长增高之象，不独无以争胜于欧洲，抑且不能媲美于中国。是犹水之出于源，而不能高于源。青之出于蓝，而不能深于蓝。其势则然也。兼之侯国争雄，事权不能归一。将军专政，君位几于虚存。安望有振兴之日哉？此日本三十年前

之情形也。夫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日本闭关自守，不与各国往来，正如人之杜门不出，不知世务。徒拘古法，见闻甚隘，无从得观摩之益，何怪其甘心自域，而不知求进于道乎？洎乎明治维新，迁都江户，改名东京。诸藩纳土，西法盛行。横滨、神户、长崎、大坂、筑地、新泻、箱馆、夷港等口，与各国立约通商，政令遂为之一新。西人之足迹，几遍乎国中。东人之游踪，广行于海外。始恍然于旧法之不足图存，而自悔从前猜忌外人之非计也。此念实为一人一国，变化进益之第一关头。《书》云：“满招损，谦受益。”《礼》云：“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其即斯意也夫！日人既得闻泰西政教风俗之美，而心焉慕之。于是君臣士庶，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厘定新政二端，以为变化之根本。一为改变君权，务使合而为一。前者，君王垂拱仰成，遇事不能自主。今则黜将军之位，而权不下移，纳侯国之土，而改为郡县。庶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矣。一为改变民心，务使人各自主。前者，误信儒教，以服民为要图，往往高视天子，而轻视庶民。其弊也，君民悬绝，不相亲近，驱民如奴，无复自主。坐使廉远堂高，情同虚设，士习民风，永不长进，甚可惜也。自今以后，当设良法，使君民相亲，以故明治亲政之时，特集公卿诸侯，明示诰诫五条。一曰：内外政事决于公论。二曰：上下一心，以谋富强。三曰：文武并重，各遂其志。四曰：一洗旧习，而归正道。五曰：广求智慧，不分中外。信能行此五者，国势未有不富强，民心未有不坚固者也。日本于当时，既定以上诸例，国政维新，民风丕变。取泰西各国兵农工艺，一切有益之良法，次第行之，以增长其智慧，更新其教化，奠安其国家。历年，派人前往各国，学习查考，择其善者而从之。举凡造船之法，制炮之方，水陆营制之精良，工作制造之巧妙，无不撷西国之菁华，开东方之利益。而其尤有益于国家者，厥惟振兴文学一端。明治初年，即降谕旨云：今观国人之文学，衰微极矣。若与西国之文学，絮短较长，可耻

孰甚焉。嗣后，当勤求新法，以兴学为要务。深望通国臣民，力学不怠，以免贻羞于邻邦云云。于是始派国中聪颖子弟，分赴英、法、德、美诸国读书，以便学成回国，储为大用之才。查日本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次派员出使外洋。其派赴美国之署理公使，实为森君有礼。森君之使美也，除办理交涉事宜外，特奉朝命，就近查访美国文学成规，以为日本兴学之先导。于是照会美京文学部大臣暨各部大臣、议院各绅，并缮公启一通，分致各大书院监院，及一切著名文学之人，广求设塾之良规、教学之成法。森君幼时曾在英国读书，颇著名誉。且留心当世之务，精益求精，以故美国之官绅皆敬之重之，且乐于答复之。一时名言说论，纷至沓来，裒然成集。森君乃编次各函，勒为一编，翻成日文，颜其名曰：《文学兴国策》。邮寄本国，上之于朝。朝廷采而用之，延聘泰西之名师，大兴日本之新学。至今学校盛行，分门别类，节目繁多。总计通国官私大小各等学校，多至三万余所。男女教师，多至九万余人。男女生徒额数，多至三百余万人。俱隶文学省。其设立大学各科，以及师范、聋哑、废疾等学校，几与美国之学校相若。且以勤求西法，故无学不有西文，即日皇亦熟习之，以通时务。并以专重武艺，故无学不习体操，即运动手足以舒筋力。故处今之世，论今之人才，日本之内外文武大臣，何一非谙习西文，熟游西国，通达洋务之人乎？以此图功，何功不就？以此谋利，何利不兴？不诚足为今日之华人告哉？仆寓华三十余年矣，其间，应聘主讲者有年，译报主笔者有年，设院课士者有年，即今之著书广学者亦有年。区区之心，实于中国有不胜其图报地主之情，用是不揣固陋，特取森君有礼所辑之文学兴国诸书，译成华文，并延吴江任申甫茂才廷旭笔述之。任君长于翻译，曾经奏派随使美邦，取道东瀛于美日两国文学之成法颇有见闻，故甚乐于从事。且能将当日作书者之高见特识，曲曲传出，期于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以无负森君兴学教民、勤勤求益

之至意。方今中国特设官书局于京师，隶其事于总理衙门，简派大臣以督理之，似亦未尝不深明文学足以兴国之故矣。然而兴学不可无成法，此尽人知之者也。取法不可无成效，此尤尽人知之者也。兹观是书，以美国之成法，行之于日本，业已明著大效矣。岂不可以日本之成效，转而望诸中国之人乎？吾知中国之贤士大夫，得是书而读之，当亦翻然变计，而知所取法矣。虽然，此非仆一人之私言也。日本相国伊藤侯，尝游学于英国。迨事权在握，一切维新之治、变革之方，出于侯之手者为多。上年，中日议和之时，合肥李傅相在日本之马关，初见伊藤侯，即叹云：“阁下在贵国所兴之事，大著功效，鄙人亦久愿在敝国仿行之。惜一言新学，即有言不能尽之难处，如阁下设身以处鄙人之地位，当亦知其甚难矣。”夫以功高望重之傅相，身临其地，心仪其人，矢口之余，早已明见及之。此可见中国之人，实已知旧学之不足，与新学之当兴矣。日本崇尚新学，其兴也淳焉。中国拘守旧学，其滞也久矣。诚使当世主持学校之人，均奉是编以为圭臬，当愈晓然于旧学之不足，与新学之可兴矣。试观日本之文学，与年俱进。国家之富强，亦与之俱进。考诸史策，证诸见闻，日本今日蒸蒸日上之情形，不独异国人见之，无不惊以为奇，即日本当国之大臣，亦见之而以为念不到此矣。尚何人敢谓文学无益于国哉？自新学既兴，而昔时声望赫赫之大臣，由今视之，有歉然不自满者矣。更观历年出洋肄业回国之人，其精神之完固、意气之勃发。谓非得受基督道之教化，安能至是哉？日本于学成返国之人，既尽令其明试以图功，则造就为怀之人，自觉兴高而采烈。由是而推之一国，其变化岂曰难乎？今中国如欲变弱为强，先当变旧为新。振兴新学之初，速当选派国中强壮循良子弟，出洋学习。此事为最有益于国家。尤当遴选宗室人员，及满洲人士，分赴外洋诸国，宽予年限，卒业而归，以充著书译报、临政兴学之职司，必较之汉人为更有利于朝廷矣。仆羁旅之

人，虽报称之无力，实望治之有心。窃见西法之转移国俗，未有如日本之速者。惟愿当国者，俯采刍蕘而施行之，是则仆所深幸也。是为序。

光绪二十有二年季春之月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月美国
林乐知序于上海广学会之寓斋

日本驻美国京城 护理公使森有礼公函

敬启者：自膺简命，驻贵国京都护理公使，除办理美、日交涉事务外，尚奉特旨，访察一切凡有益于敝国文学诸事，并讲求一切凡有关于敝国振兴诸端。度阁下必有卓见良策，请烦一一指教，以作东方开化之助，实为幸甚。窃以敝国所访求之大略，凡增人智慧，辅人德行，利人身家，种种有益于国政民俗者，悉请开诚相示。若与文学相关，而为今所专重者，厥有五端：一曰富国策，二曰商务，三曰农务与制造，四曰尽伦常、修德行、贍身家，五曰律例与国政。阁下必能洞悉其渊源，而有以详细示之也。倘蒙俯允，赐以覆函，或示一端，或示全璧，悉从尊便。敬当视为至宝，什袭藏之。他日将原书译为日文，刊印成书，上呈有司，下示人民，俾敝国君臣士庶均有裨益，皆出阁下之所赐矣。伏惟鉴察，不宣。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华盛顿京城日本使署发。

埃尔博学书院 监院华尔赛复函

敬复者：前奉来函询问一切，略赠数语，以应雅意。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能使人勤求家国之致富耳。盖人既读书，即能日辟其新知。既有所知，即欲得而用之。用者愈多，制者愈精。人各逞其心思才力，以争胜于世，而务求节劳利用之良法矣。且可信各种益智之学，无不与各业相通。士农工商既皆日启其聪明，虽未必各精其本业，但立身既高，所见必远，推之各业，安有不兴乎？然以愚见论之，国人有如此之学问者，尤必济之以自主之心，务使自择兴利之途，不拘世业；自定工作之地，不限方隅；且自订工价出产之例，不复以国法抑勒之、限制之，否则遇事牵制，不能有为，是徒有其学问也。将见始也抑郁不舒，终也恃才妄作，反不若不学之为愈矣。所以通国皆有学之人，亦必通国皆自主之民，而后可也。至若来函所访之专重各条，谨缕陈于下：

一、论文学有益于富国。凡民之读书者，见人有新创之物，必求有之于己，往往勤其工作，劳其心力，自造他物以为交易之计，而不使人得专其利。且读书之益，又能使人启发心思，振兴新法，以尽制造之利；更能使人熟悉本国与他国市面所需之物，以谋贩运之利。总而言之，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有所不足，即有求其足者，犹之人有所欲，即有给其所欲者。富国之策，在于是

矣。盖至是而向所未知之物，今则尽人可得而有之矣，岂不足以致富哉？

一、论文学有益于商务，亦若是也。通商之事无他，以一人、一方、一省、一国所有之物，运之于他人、他方、他省、他国而已矣。通商于他国，亦犹通商于本国。路有远近，事无异同。我造此物而大利生焉，人造彼物而大利亦生焉，彼此有无相通，得人之利仍还之于人，所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至于读书之益，亦无他说，不过谓其能扩充人之智识，能磨练人之心思，使天下之商皆晓然于各国之物产、市面之消长，运货有至贱至捷之法，造船有至稳至快之式，而且设关收税，亦有至善之规，不使一业有掣肘之虑，是乃读书之明效也。

一、论文学与农务、制造相关之处。前二条既言文学之有益于富国与商务，亦必有益于农务、制造，不待言矣。惟农功一事，当加讨论。农务为各国事业之首，以其为生民粒食之源，及制造各物料之所从出也。方今天下农民，有受人之值而代耕者，由于逼迫，非其所愿为也。亦有租人之田而耕种者，以为地非己有，不但四体不勤，甚至芜秽不治。如此之人，大都刁滑、偷窃、谎骗之流，其所以不为患者，正幸其愚而无知耳，苟进之以学问，恐多不约束之害矣。今欲除其害，莫若释放国中之农，令其自主，得受田以自耕，则彼将视为世产，有传子孙、保身家之心，其必竭力耕田也无疑矣。若更使之读书，不悉成为国中诚实可靠、至无足虑之民哉。

一、论文学有益于伦常、德行、身家。此一问也，求伦常、身家之益于文学中，则见为有余；求德行之益于文学中，则愚窃以为不足。夫修德之功夫，所关尤巨，人若但精于世道、人心、物理之见识，而无修德之家规、塾训以培植之，终不能自成其德行也。且德行之所包者广，举凡在家为孝子，在外为良友，在国为忠臣，在神为信徒，皆不能置于文学之外。而尤要者，莫如教人以自约自束、自尊自重之道，诚能文学与德行并懋。再进之以养生之法，然后训人

者以立德、保身并重，益可信文学之大有益于众人矣。此意于前答诸条已经表明，无庸赘论。

一、论文学之有关律例、国政，厥有多端。民既明理，则舆论自公，在上者无论民主、君主，不能不为其所感矣。公道既明于人心，不复专顾一己之私益，众皆知守法，而乐于为善矣。且也，日见黎庶之富饶，而无贫富不均之患；重视人民之财产，而无豪强并吞之虞；厘定收税之良法，而无胥吏侵扰之虑矣。至于执政之人既知向学，则愈可洞然于君民一体、上下相通之故，而休戚相关，忧乐与共矣。若更能知他国之律例、国政，而以本国者与之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其获益于读书者岂浅鲜哉？

以上诸说，皆文学之有益于国者，谨撮其大略言之。如蒙采择，或于阁下所访问之端，未必无小补矣。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纽海文发。

安汉斯德大书院 监院施端恩复函

敬复者：接读二月三日暨十二日两次惠函，得悉阁下今欲讲求兴国利民之学，不禁偕敝邦之爱国、爱民诸同人，欣喜不置。谨当拱手，藉阁下为介绍，得与贵国君臣士庶引为同志矣。窃谓诸君之答复，论及至善、至妥、至捷之法，以兴贵国上等之教化者，必将各按一己之阅历见闻与夫心得之端，著为各异之词，以达于左右。惟以愚见论之，阁下所访问诸条何等重大紧要，不能先抒其意见，必当首论其根基，即泰西各国教化与实效之根基，所谓基督之教道是已。且所谓基督之教道，非指各教会如希腊、天主、耶稣等教，以及徒有教名、毫无教益之事，特指《圣经新约》中，有纯一不杂之基督教道，乃未立教以前，基督所面授，及各使徒所阐扬者也。此道无论何处，由明者、善者讲之，无为己、为国之私心，遵基督之命，不与国政相干，惟宣扬天国之道。彼闻而信之者，必多心服于道中平安、清洁、尊贵之势力，且本其仁爱无私之心，更将广传其道于势力所可及之人，从此基督教之德性品行、爱心善事，无处不兴。推而广之，扩而充之，未几而一切更新，奇效大著。以故敝邦奉教之名儒硕彦，尝考基督教道命意之所在，除论及来世救人灵魂之外，亦在振兴当世之国与人，即振兴其学问之聪明、品行之良善、身家之利益耳。因此道之本源，直从《新约圣经》得来。苟乐受之，决无不